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应葵： 一个被历史遗忘了 三个世纪的人物

Kapitan China of Malacca Chan Jamqua (Zeng Yingkui):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had been Forgotten for Three Centuries

庄钦永
(CHNG Khin Yong)

摘要

论文主要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度藏的《史氏档案》，填补一个被历史遗忘了三个世纪的人物——曾应葵——进入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内，并勾勒出曾氏的简单生平事迹，包括他在1771年康熙颁布海禁令前到广州贸易，与林奇逢等认识，以及海禁后专注在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活动。论文也详细探讨曾应葵与印度马德拉斯港脚商人约翰·史卡特尔古德（John Scattergood, 1681-1723）等人的贸易关系。

关键词：曾应葵、马六甲、甲必丹

* 在撰写这篇论文期间，承同道挚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苏尔梦教授（Professor Claudine Salmon）提供《李氏族谱》及厦门曾厝垵曾氏宗祠相片，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提供曾应葵亲笔书写文件的多张照片，笔者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庄钦永 哲学博士，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兼任研究员。

E-mail: DAVID.CHNG@e.ntu.edu.sg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6

Abstract

Based mainly on *The John Scattergood Papers* hous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this author adds another name Chan Jamqua (Zeng Yingkui),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had been forgotten for three centuries, to the list of Kapitan China of Malacca. This article portrays Chan's sea trade activities with Canton merchants before and after 1771 when Emperor Kangxi carried out the sea prohibition, stopped virtually all exports and all trading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most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xcept the various East India Companies. It also traces in detail the trad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n and the Madras country trader John Scattergood (1681-1723).

Keywords: Chan Jamqua, Malacca, Kapitan

一、前言

1936年，马六甲历史学会刊行了《马六甲历史导论》（*Historical Guide of Malacca*），其中叶华芬（1905-1964）所撰写的〈马六甲之华人〉（*The Chinese of Malacca*）是学界第一篇较为全面探讨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课题。尔后，整整80年，经过马来西亚黄存燊、郑良树（1940-2016）、陈铁凡（1912-1992），日本日比野丈夫（1914-2007）、新加坡许云樵（1905-1981）、庄钦永等学者的研究，学界对于1511年葡萄牙统治时期到1826年英国废除的甲必丹系谱，大体上有相当的认识与了解。但是，由于史料的匮乏，有些甲必丹的姓名，我们仅知其葡萄牙语、荷兰语或英语的拼音，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也不甚了了；而且系谱中的一些问题至今还未得到完全的解决，例如叶华芬文中提及在甲必丹曾其祿之后，他的儿子被委任为甲必丹即是一例。叶先生此说未言所据为何，如所说属，曾其祿有五子，究竟是哪个？这些问题都有待同道继续努力，挖掘中外文献史料，揭开谜底。

2003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印尼华侨史大家苏尔梦教授（Professor Claudine Salmon）在印度尼西亚望加锡的永裕堂发现了《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省嘉禾里廿二都曾溪保绥德乡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

（以下简称《李氏族谱》）。2013年11月苏教授与柯兰博士（Dr Paola Calanca）把这族谱送回厦门光裕堂李氏族人。2015年，她们俩利用新发现的《李氏族谱》，联名以法文发表〈一个福建家族的历史：海外贸易与世代演变〉（*Histoire d'un groupe de parenté du Fujian Commerce au-delà des mers et mouvance*），刊载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101期上；苏教授也以英文写了〈马六甲施善华商与公众记忆——以李为经（1614-1688）为例〉（*Commemorating Chinese Merchant Benefactors in Malacca: The Case of Li Weijing [1618-1688]*），登载在《淡江史学》第27期上。同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阮湧洵也撰写了〈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以《厦门光裕堂李氏族谱》为依据〉，刊载于《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这三篇论文让学界更多认识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之家庭背景及生平事迹，贡献非凡。承同道好友苏教授盛情厚意，寄赠以法文写的那篇鸿文。从注脚所引资料文献看，肯定它就像以往苏教授所撰写的论文一样，是非凡精品。可惜我不谙法语，无法拜读学习，殊为遗憾。对于阮先生大作，我精读再三，深佩其治学之严谨与功力。阮文中有一人名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曾应葵”，这是一位被历史遗忘了整整三个世纪的历史人名。26年前（1990年），笔者撰写〈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时，提及Chan Jamqua之名，由于无法从曾其祿神主牌后裔名字中找到对应，故推断他或许是曾应菊。而今，阮文有两处明确地说曾应葵是马六甲华人甲必丹，¹就此揭开谜底，解决一个基本问题。惟阮文未言其说所据史料，或许也由于Jamqua与“应葵”无一音节可以对应，出于谨慎，就没讨论〈新探〉中的Chan Jamqua是否就是曾应葵。我因手头有一些关于曾应葵的资料，于是心血来潮，重拾旧题，再参考相关论著，草成此文，就正于方家学者。

二、发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Chan Jamqua之过程

在研究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课题时，学者大都利用青云亭中的碑刻资料

（如神主牌、碑记等）及墓碑文字，鲜少使用外语史料。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历史学家挖掘出来的中文史料利用殆尽，如果在这个课题研究上要有突破，就应该使用外语档案文献，结合碑铭资料及先贤时人的研究成果。拙文〈新探〉就是利用外语档案文献所写成的一篇笔记式短文。

1986年，我到英国工作两个半月，那时没有手提电脑，也没有电邮。单身只影，长时间居住在外国旅馆，晚上没事，惟有看书解闷。那年头，我对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这一课题有些兴趣。我想马六甲地处印度洋贸易圈交通要道，在18世纪时，这个港口城市是一个商品中转站。每年4至9月有商船乘西南季候风从印度北上中国贸易，10至3月又乘东北季候风，自中国南部往南返回印度。在往返途中，商船必经马六甲，停留数天，补给船上粮食、水供，卸下从印度或中国运载商品；或从马六甲运载汇集在这里的东印度群岛货品，输送到印度或中国销售。² 据此，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应该与这海上贸易有些关系，或许我们可以从印度洋贸易网络中寻得一些蛛丝马迹。

西方历史学界，研究17-18世纪印度洋、东南亚贸易网络的学者众多。犹记当时我在伦敦大学附近一间高四五层楼的书店，购买了刚在1985年由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查胡利教授（K. N. Chaudhuri）撰著的《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自伊斯兰教的兴起至1750年的经济史》（*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晚上无事就捧着啃读，就此对这领域有些基本认识。回到新加坡后，业余时间，我开始找这方面的英文论著来阅读。有一天，我读了一篇论文，作者据《约翰·史卡特尔古德档案》（*The John Scattergood Papers*，以下简称《史氏档案》）说，1714-1722年间印度东部马德拉斯（Madras，今名Chennai [金奈]）的英国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约翰·史卡特尔古德（以下简称史氏）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Chan Jamqua有贸易关系。读后兴奋不已。

史氏是何许人？他是18世纪马德拉斯一名著名的英国商人。16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马德拉斯的租地权，开始在此营造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1649年，这里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亚洲贸易的重要根

据地。1681年，史氏就在此出生。长大后，他回英国接受教育。1697年，他回到马德拉斯，时年16岁。一个月后，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一名职员，开始其四处奔波的贸易生活，足跡遍布波斯（今天的伊朗）、孟加拉、孟买、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及中国。在东印度公司工作20年后，1717年6月，获得公司董事部的许可，他成为一名港脚自由商人，此后与人合资购买商船，专注川行于印度、中国的贸易航线。

1723年，史氏因病去世。因处理其留下大笔遗产，后人闹上法庭，于是史氏生前所留下的文件就被送到法院去验证。多年后，它们又被转送到英国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2003年易名英国国家档案馆）储存。³ 这些文件年代最早志日1698年，最晚的是1724年，其中有史氏与家人、朋友之来往信函，也有商业文件如合约、商船货物投资人及投资数额表、贷款存单、收据、账目，等等。1916年，理查·荷沃迪（Richard Holworthy）接受史氏后人伯纳德·史卡特尔古德（Bernard P. Scattergood）之聘，代为研究先人历史，无意中他发现这批尘封200年的文件。在取得有关当局的同意后，荷沃迪做了誊录工作，并准备了三份打字稿，由伯纳德分别送给大英博物馆（现归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及伦敦市政府所主持的吉德豪尔图书馆（Guildhall Library）收藏。⁴

1989年，我申请了假期，重访伦敦，到大英博物馆暨图书馆手稿部，调出《史氏档案》，⁵ 它就是当年伯纳德所赠送的其中一份，索书号Mss Eur 387/1-4，凡4册。我用了好多天详细阅读并抄录了有关资料，发现除了Chan Jamqua外，文件亦有将其姓名写作Chan Yungqua、Jan Younqua⁶ 等不同形式。档案内有多个Chan Jamqua亲笔签署的文件，日期介于1714年和1724年，誊录本中皆以“mark of Chan Jamqua”（Chan Jamqua的记号）字样代替。这“记号”究竟是什么？是个人名章？商号盖章？抑或是中文签名？当时，我想不论是哪一类，肯定都能帮助我们知道Chan Jamqua的真正中文姓名或其商号。我原有意到公共档案馆翻查原件，但由于假期即将结束，只好返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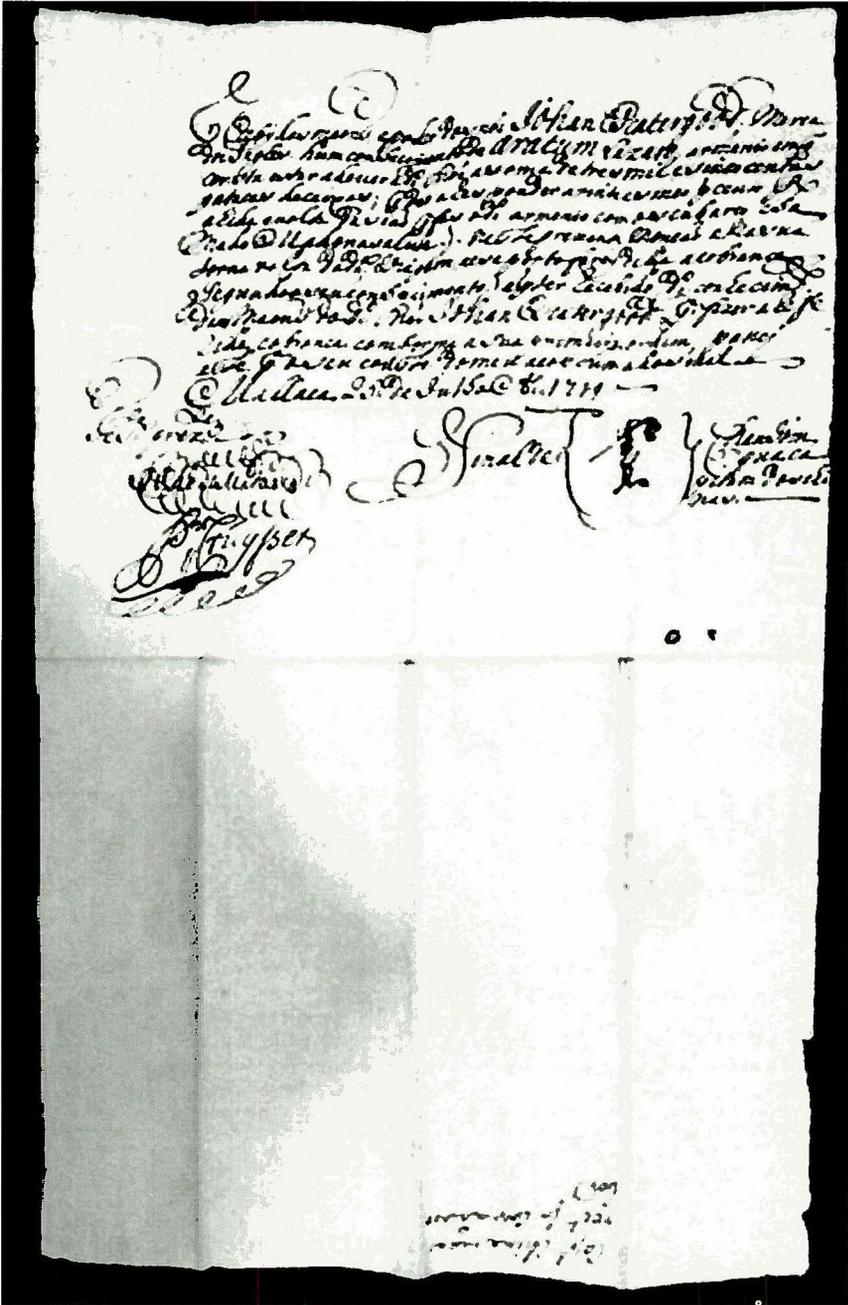
回新后，工作压力颇大，异常忙碌，日复一日，精力消耗殆尽，最

终仅写了约三千字一小节简单介绍这一发现，插入〈新探〉一文中。⁷此后，研究马六甲华人史学者多有引述。⁸尔后虽有多次远赴英国，因研究兴趣已转向其他领域，我对这一问题再也没进一步去追查。近日，找出当年所抄录的资料，再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出Chan Jamqua亲笔签名的多个文件。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深入分析，将Chan Jamqua的一些具体的认识，呈现在读者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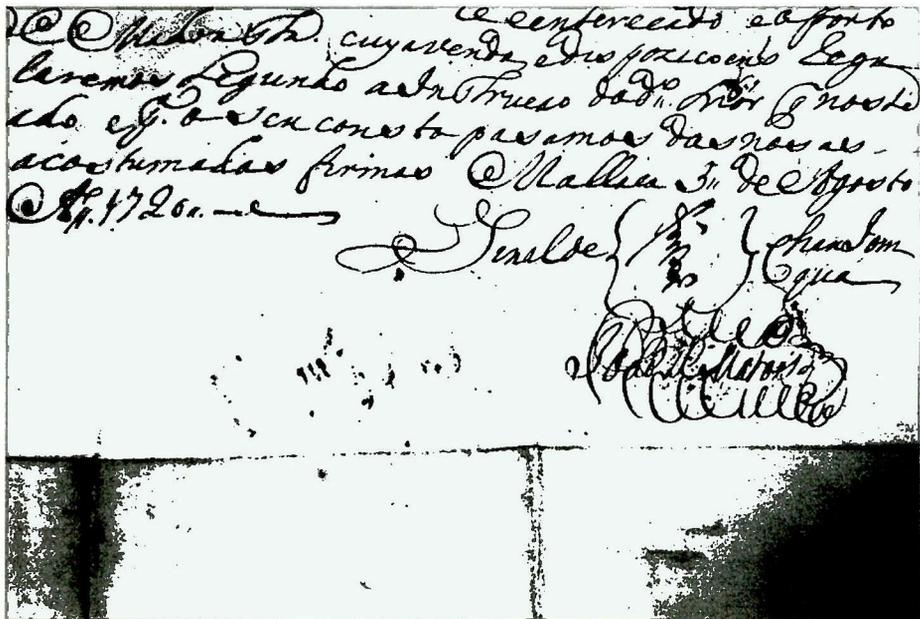
三、Chan Jamqua即是曾应葵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C 106/170和C 106/171⁹即是《史氏档案》原件，档案题名：Scattergood v. Raworth: correspondence and accounts of John Scattergood relating to trade with India and China（史卡特尔古德对拉沃特案：约翰·史卡特尔古德在印度与中国贸易的书信和帐目）。其中有曾应葵亲笔签名的文件最少有7个，都是以葡萄牙文写成，这是目前我们所发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中留存于世的纸质文献，是马六甲华人史上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不过，查看这些原件的记号后，出人意料之外，大失所望，它并不是曾应葵的个人名章、商号盖章，也不是他的中文签名，而是两个中文字：“生意”（见插图1、2及5）。

图片1：曾应葵借款与Aratum Lazaro所签署的合约



图片2: 曾应葵签署“生意”二字放大图



Sour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从书信内容、日期判断,《史氏档案》中的Chan Jamqua¹⁰、Chan Younqua¹¹及Jan Youngqua¹²所指是同一个人。今据阮文,我们确定他就是曾应葵其人。“Chan”是“曾”的厦门语拼音。“qua”是“官”(厦门语koan)¹³,意思是先生。清道光周凯编纂的《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云:“闽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孙曰舍,呼有体面者曰官。”¹⁴至于“Youn”、“Young”当是Yin、Ying之误写,是“应”之对音(“应”厦门语读作in)¹⁵。18世纪外国商人对华人行商的称呼,大都仅以他们名字中的一字代之,如天宝行行商梁经国(1761-1837),称其作Kinqua(经官)¹⁶,逢源行蔡世文(?-1796),叫他作Monqua(文官)¹⁷。史氏与曾应葵自己均使用当时流行的这种称谓法。从曾应芸(应葵之五弟)神主牌陷中文字记:“君名诩字仲植讳应芸”¹⁸,得知应芸有单名“诩”,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Jam”、“Jan”是应葵之单名。至于它究竟是何字,有待他日新史料之发现。据此,Chan Jamqua即“曾Jam官”(姓氏

加单名)、Chan Younqua即“曾应官”(姓氏及讳名中之第一字)、Jan Younqua即“Jam应官”(单名、讳名之第一字并称),它们都是曾应葵姓名的不同组合拼写方式。

曾应葵,福建银同禾浦(现在的厦门岛东南部思明区曾厝垵村)人,禾浦,别名曾里,又称曾家沃,曾家湾。曾家与李为经家族是同乡。在中国,曾、李两家时有联婚,¹⁹ 迁居马六甲后,也是如此。甲必丹曾其禄(1643-1718)即娶李伟经之次女李成金(1661-1724)为妻。尔后,曾其禄又娶年龄比他小29岁的侧室名意娘(1672-1754)。²⁰ 妻妾俩共为其禄生下五男,其中一子当在1718年其禄去世前就离世:李成金生应菊、应芸(1703-1732),意娘则生应葵与应莪。²¹

图片3：座落于厦门曾厝垵文创村的曾氏宗祠（苏尔梦教授摄于2014年）



苏尔梦教授提供

说来奇怪，曾应葵虽曾担任领导马六甲华社的甲必丹重职，但在青云亭内却未见有神主牌留存下来，供人奉祀；而在华社未见有任何显赫地位的五弟应芸，其神主牌和其父其祿艺并置放在庙亭内，享有荣耀。²² 职是之故，我们对于曾应葵的生卒年、妻室（如有）及後嗣名字等基本信息一概不详，惟有通过细心爬梳研读《史氏档案》，对他有一些的认识。

第一，最迟在1714年，曾应葵就接续其父出任华人甲必丹。该年6月，史氏写给马六甲的代理人、葡萄牙人约翰·德·玛托斯（Joao de Mattos，有时作John de Mattos）²³ 的一通信时，就称曾应葵为“the Captain China man”（华人甲必丹）²⁴。假如其母意娘在1688年16岁时生应莪，翌年，1689年17岁生应葵，那么1714年应葵出任甲必丹时，已经是25岁的年轻人了。从1744年曾宪魁接续曾应葵出任甲必丹这一史实推断，估计他担任甲必丹一职大约有30载之久。

第二，18世纪的马六甲是一个多元种族杂居的社会，其中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而以葡萄牙-欧亚人（Portuguese-Eurasian）占绝大多数。²⁵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部分华人能以外语与异族沟通，甚至通婚。例如李为经除正配徐惜娘外，也娶宋氏（可能是马来人）²⁶；其子正壕也娶“麻六呷人”²⁷（应是葡萄牙-欧亚人，或马来人）。他们所生下的第一代土生土长的后裔，大概都能听、讲多种语言如葡萄牙语或马来语。我们可以肯定，荷兰政府绝不可能委任一个只谙中文或厦门语的人成为华人甲必丹，因为他必须有能力和其他族群甲必丹就一些问题共商同议。《史氏档案》记载，当史氏欲收购锡时，曾应葵请求马来人甲必丹协助，这证明曾氏是能以马来语与人沟通；在处理史氏交易时，曾应葵又以葡萄牙语和德·玛托斯商洽；当他与史氏签署商业契约时，文件也以葡萄牙文书写（这间接证明曾应葵不谙英语）。²⁸ 1719年8月曾氏以葡萄牙文写了一封信（本文第三节以中文译出全文）给史氏，信中有一句话这样说：“我附夹在这通信里有一份亚齐港货品名单供您参考，它是以中文书写，因为我担心我所翻译的葡萄牙文或许有些错误（附夹在约翰·德·玛托斯信中）。”²⁹ 信中未言这信由人代译，在在说明曾应葵是谙葡萄牙语。

第三，1713年至1722年间，曾应葵是史氏在马六甲的忠诚贸易伙伴。

他是海上贸易商，是史氏的贸易中介商：他代史氏销售商品，也代他收购所需求的商品，以便运送到中国或印度售卖，谋取利润。他也是史氏所信任的好友。下面第三节将详细探讨。

四、从《史氏档案》窥视曾应葵之海上贸易活动

在还未正式探讨曾应葵的海上贸易活动之前，我们得先了解马六甲在印度洋贸易圈中的地位，以及明末清初中国南部沿海，特别是福建海上贸易概括。

在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前，马六甲是个历史极其悠久、地理位置优良的重要贸易商港。西亚和印度的回教商人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这个港口城市交易中国货物和香料；琉球和中国方面则南下这古城交易回教商人的货物和香药；爪哇商人也到这里供给粮食和香料，运回印度、西亚和中国货品。可是，自马六甲沦陷于葡萄牙人后，各国商船就避开这港口，直接往访商品生产地或供给地。³⁰ 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赶走葡萄牙人，虽然有意将这个港口发展成印度-海峡-中国航线的贸易据点，但受到公司设在东印度群岛营运总部巴达维亚（Batavia，今天的耶加达）的竞争，它还是一个仅能继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³¹

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后3年，后金建立者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进军中国本土，消灭了统治中国270多年的明朝政权。明朝崩溃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海上贸易主要是在郑成功支持下扩展的。1646年（清顺治三年）郑成功海上起义后，为了与荷兰人竞争，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船队，扩展海上贸易，把中国、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联结成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面对这样一个形势严峻局面，1655年（顺治十二年）清廷规定，除非得到官方执照，商船不许出海。1661年（顺治十八年）又颁迁界令，把沿海居民迁入距海岸几十里的内地，并禁海舟商船出海。翌年，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1642-1681）接续统治台湾，直到1681年去世。就在这个时段，李为经、曾其祿家族成员多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与明郑反清集团有联系，高举反清复明旗帜。³² 李为经的哥哥为纪（1611-1653）也“贩麻六

甲”³³，曾家在家乡掌理饷馆，处理往返商船检验和税收。³⁴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终于征服了台湾。翌年，开放海禁，禁锢已久的中国贩洋船，“无分大小，络绎而发”³⁵，“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³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在这个时候开始来华贸易，印度的英国港脚贸易商人就此兴起。³⁷ 1699年至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43艘商船前来中国贸易，而1716年至1720年，则每年有2艘。³⁸ 正如著名英国史学家彼得·玛薛尔（P. J. Marshall）所说：“18世纪初，所有的亚洲商船似乎都丧失了东南亚和中国的立足点，而把地盘让给来自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英国商人。”³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13年史氏第一次到中国贸易。两年后，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城外西郊设立商馆，成立了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负责英中贸易与外交事宜。⁴⁰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因朝廷怀疑归航的船只太少，又恐怕国人有偷运米石接济盗匪之嫌，康熙帝深感不安，于是效先帝，再颁禁海令，规定除东洋（日本、琉球）、暹罗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东南亚；惟外国商船照旧准许前来中国沿岸港口贸易。为继续谋生，闽粤江浙商船，纷纷虚报到澳门、安南贸易，实则潜越禁令，通贩巴达维亚等地。⁴¹ 曾应葵和史氏就是在康熙帝颁布海禁政策前后进行海上贸易活动。⁴²

（一）曾应葵在广州、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上面我们说过，明末时，曾、李二氏家族成员在中国家乡多从事海上贸易。“避难义士”曾其祿南下马六甲后，是否如李为纪一样仍续祖业，目前没有资料解疑。但他的儿子应葵确实是沿袭先祖之业，以海上贸易为生。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曾应葵给史氏写了一封信（参见图4与5）。这信虽不是很长，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从中窥视曾应葵在海禁前后与中国行商、史氏的贸易关系。信函是以葡萄牙文写成，约一个世纪前由吕诺拉·德·阿伯提女士（Miss Leonora de Alberti）译成英文如下：⁴³

Mr John Scattergood

My dear Sir

I hope you arrived in good health to continue your customary favours to me, I am ever at your command. I have delivered the balance of the new accounts to the captain of this ship Bonita. I have also excuted your order with respect to Mr. Ares Harris who presented me with the same order I had received from you.

Enclosed I send you the list of the goods which are of use in the Port of Achin, written in Chinese, in case of mistakes which may occur in the Portuguese translation I have made, enclosed in Joao de Matos letter. I am under obligations to make arrangements as conveniently as may be for your Worship, for which purpose I will have the slopp in readiness to be laden at this port before your arrival with the merchandize which you hope to bring and ship to the port of Achin.

Respecting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Malay captain which you recommended to me, I have taken the steps you advised, and the said captain gave me his word to negotiate on your account for 300 pikuls of tin, and so soon as he requires the money for security in the matter I will not fail to pay it to the said captain.

As to the pesas de lenas, a brigantine of a friend of mine will leave in four days from now for Batavia, and I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transmitting the quantity demanded and what I can I will obtain in this land.

The brigantine with the sugar for which we arranged to negotiate I expect to arrive any hour from Java both the brigantine and the sugar; and once arrived I will fulfil my contract and settle the matter in time for your order and that of your associate Mr. Arnegly to be executed in November when it is received.

There is further enclosed in the said Joao de Matos letter a separate notice of the prices at which the merchandize contained in the list may be bought in China, which I send for your Worship's guidance. Following this, things may be reg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ces obtaining in the country, advising you for your better guidance that the

prices I have put down are more or less accurate.

I trouble your Worship to buy me for the service of my household 20 cloth chairs, which can open and close, and a small table of rosewood, like the chairs. I am writing by this opportunity to Limqua to arrange this matter and deliver them to you to bring them. Nothing further offering, may our Lord preserve you many years as I desire.

Malacca 7 of August 1719.

Your Worship's friend and most humble servant

CHAN JAMQUA

Be kind enough to bring on my account two picos of misoa, called in that land Laqasi, for incidental expenses.

Mr. Thomas Ares Harris takes a sesto of trubo, which your Worship can make use of if it is good. Pardon me for having no other present to offer you.⁴⁴

笔者据上面译文，转译为中文如下：

约翰·史卡特尔古德先生

我亲爱的阁下：

我希望您抵达目的地时，身体安康，继续给我像往日那样的支持。我会永远按照你的指示去做。我托“博尼塔号”（Bonita）船长将新的货价对照表转交给你。我也已经按照您的订单去采购。这订单是通过埃利斯·海利斯（Ares Harris）转交给我，它和先前我从那里收到的一样。

我附夹在这通信里有一份亚齐港货品名单供你参考，它是用中文书写，因为我担心我所翻译的葡萄牙文或许有些错误（附夹在约翰·玛托斯信中）。我会尽力为您做最方便的安排。正因如此，在您尚未抵达时，我已在此预备一艘船，准备把您的货物运送到亚齐港去。

关于你建议我和马来人甲必丹商谈生意一事，我已照你所吩咐进行。该甲必丹同意我代表你商讨三百斤（pikuls）锡矿之交易。一旦他要求担保金，我会缴交给他。

至于pesas de lenas⁴⁵，我的朋友之一艘船将在四天后离开此地

到巴达维亚。我会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所要多数量运输到那里。我会在这里尽力为你收购。

运输蔗糖的那艘船，随时会从爪哇抵达。那些蔗糖是我们安排商讨准备收购的。它一旦抵达，我将按照契约行事，尽早完成你所订的货物，以便在11月你的伙伴安内吉利先生（Mr. Arnegly）来到时，可以进行工作。

在约翰·德·玛托斯（Joao de Matos）的信中，我尚附夹另一张能够在中国收购之货品名单价格表。它是给你作参考之用。它是根据在该国所取得之价格调查出来的。为着你能更好了解该价格表，我谨奉告，它是相当准确的。

麻烦你代为购买二十张布制家用椅子（它们是可以打开或折起来的），一张小的花梨木桌子。我藉这个机会寄信给林官（Limqua），请他安排将家具送到你那里，然后由你转送过来。别无他事，我谨祝你长命百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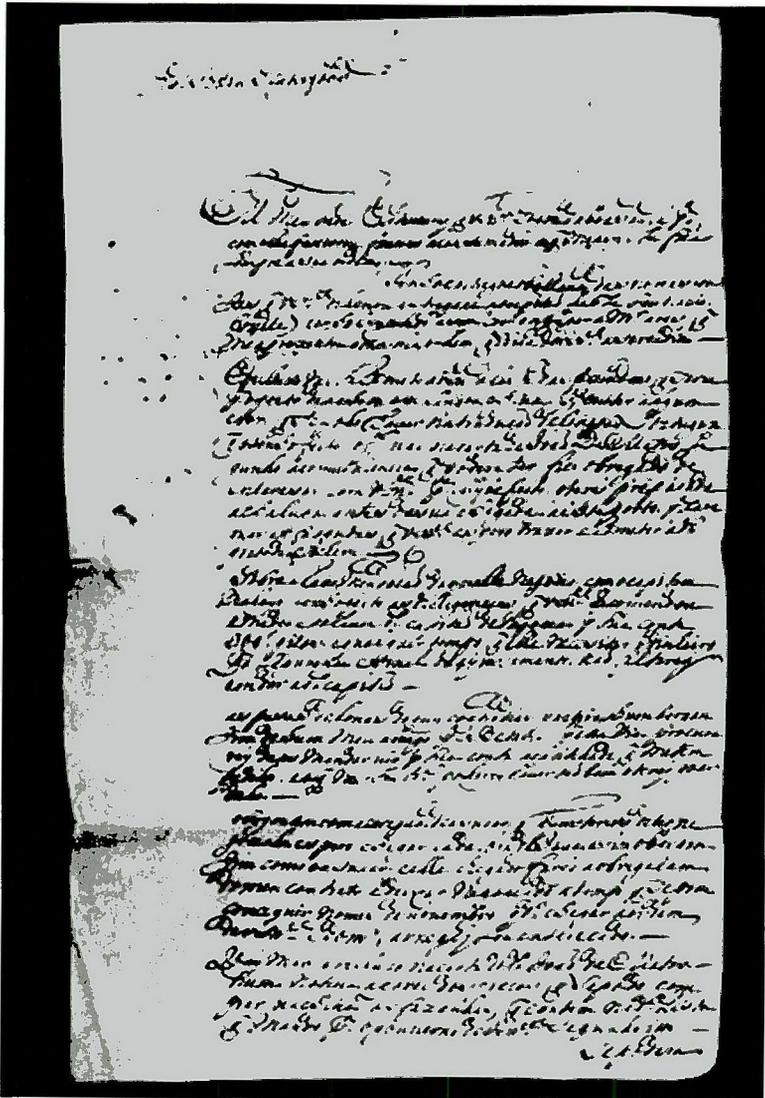
马六甲，1719年8月7日

你的朋友和最谦恭的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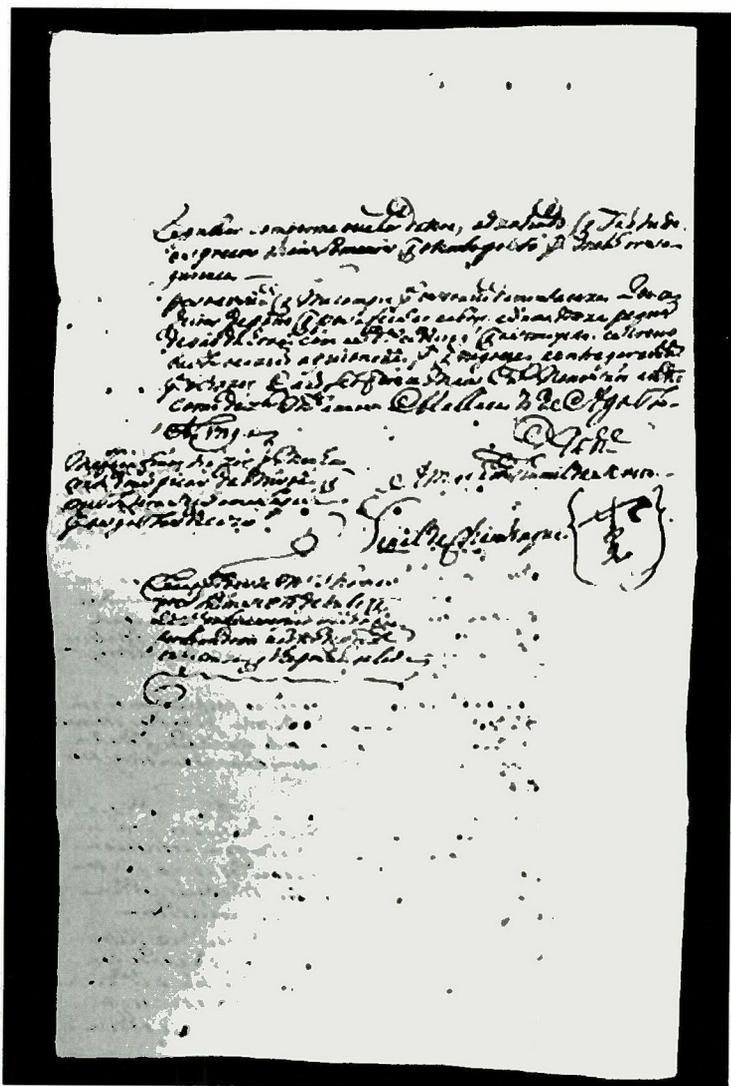
生意 CHAN JAMQUA

烦请代我购买两个misoa（当地人叫做laqasi），账面记录归入我的杂费，汤姆斯·亚力·海利斯那先生（Mr. Thomas Ares Harris）一件turbo。假如合用，你可用它。原谅我没有送你其他礼物。

图片4：曾应葵写给史卡特尔古德的一通信函（上）
（志日1719年7月25日）



图片5：曾应葵写给史卡特尔古德的一通信函（下）
（志日1719年7月25日）



图片4与图片5：深埋尘埃、静荡荡躺卧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几百年后，曾应葵的7通亲笔信函今天终于“出土”，这是其中之一件。

Sour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先说曾应葵在海禁前后与中国的贸易概况。

曾氏这封信函写于康熙颁布海禁两年后。信中的埃利斯·海利斯（Ares Harris）即史氏第四次往广州贸易的同行大班、前马德拉斯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汤姆士·埃利斯·海利斯（Thomas Ares Harris）。⁴⁶ 信末曾应葵写了这么一句话：他托Limqua

代为购买二十张布制家用椅子（它们是可以打开或折起来的），一张小的花梨木桌子。我藉这个机会寄信给Limqua，请他安排将家具送到你那里，然后由你转送过来。

这段文字的背后隐约显示，在1719年之前，Limqua和曾应葵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也成为朋友。Limqua也认识史氏。⁴⁷ 1715年，Limqua与广州另一位行商安官（Anqua）致函史氏，感谢他载送中国船客到马德拉斯。⁴⁸ 这Limqua究竟是何人？按，Limqua，档案多作Linqua（也有作Lichoncong）⁴⁹，汉译作林官。据学者考证，他即是福建龙溪人林奇逢其人。《巴城日记》记载他曾在巴达维亚住过，并在那里做生意多年。因通晓荷兰语，自1666年至1685年，受聘成为通事（即翻译员），纵横东亚海域二十几年。1666年（康熙五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二次遣使到中国时，他即是陪同荷兰使节到北京的两位通事之一。1674年（康熙十三年），云南吴三桂为首的汉族将领叛乱，他又与另一商人奉福州靖南王耿精忠、广州尚之信之命，乘船从日本载货后，运至巴城，顺便递交非正式信函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巴城总督油烦·吗绥极（Joan Maetsuycker），欢迎荷兰前来贸易。此事未果，不久，靖南王转向，归顺大清。1678年（康熙十七年），清廷派姚启圣接替总督，他又和刘仔、黄镛等使者受派遣携圣旨出使巴达维亚，约荷兰人共同出兵攻打台湾的郑经。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荷兰再度遣使宾先巴芝（Vincent Paats）到中国朝贡，林奇逢与他的儿子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⁵⁰

从1654年（顺治十一年）到1679年（康熙十八年），广州处于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俩的统治之下，除了贡舶为合法的贸易外，尚氏父子私下进行走私贸易。1676年，林奇逢回到广州后，成为尚之信的海上

贸易的代理人。1680年（康熙十九年），清廷铲除尚之信的势力，撤平南王藩。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下令开放海禁，翌年，江、浙、闽、粤海关成立，海上出入的洋船都赴粤海关监督衙门交税，⁵¹ 林奇逢成为在广州与外国商人拥有特权的著名商人。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他和Chun Yea向澳门葡萄牙人租用两艘船到巴达维亚贸易。⁵² 1703至1710年代，打倒“皇商”的势力后，林奇逢和安官、Hemshaw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理商。⁵³ 1719年他年老体衰，且因商行拖欠债款颇多，翌年，就由Ensha和Chouqua接办行务。⁵⁴ 1720年8月22日，就与世长辞了。⁵⁵ 1720年代，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及港脚商的生意转由广顺行陈寿官（Suqua, ? -1760）接办。⁵⁶

如果我们估计应葵约在1689年出生是接近史实的话，那么那年林奇逢和Chun Yea向澳门葡萄牙人租用两艘船到巴达维亚贸易，应葵刚出生，因此合理的推断，应葵到广州进行贸易大约是在1710前后。这时，曾应葵从巴达维亚、亚齐等地收购商品，运到广州交易；然后从那里运载茶叶、瓷器等返回马六甲。

1717年禁海令施行后，曾应葵就不能到广州直接贸易。《史氏档案》中有四则史料足以佐证。

一，史氏1719年7月的账目记载，曾应葵付给他2793塔（pagoda）31法南（fanam）40克斯（cash），那是“查罗迪”号（*Charlotta*）代他运送货物到中国的经费。⁵⁷

二，1719年8月7日，曾应葵写信给史氏，请他在广州代购金丝、生丝、眼镜、土茯苓（China root）⁵⁸、各种瓷器等商品，然后在年底乘季候风改变方向时，运至马六甲。⁵⁹

三，1719年11月，史氏在广州时，代曾应葵付100兩给陈寿官，填补其账头，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⁶⁰

四，1720年2月8日，史氏在广州又代曾应葵先垫上437兩（合911里克斯银元[Rixdollars]）进入其账头，用以付还给广州行商Ensha。⁶¹

这四件事充分显示，因海禁关系，曾应葵的商船已不再北上中国，贸易之事改由史氏等外国商人代劳，转而专注东南亚海上贸易。上引曾氏的

那封信中有一段显示，他代史氏到爪哇收购蔗糖：

运输蔗糖的那艘船，随时会从爪哇抵达。那些蔗糖是我们安排商讨准备收购的。它一旦抵达，我将按照契约行事，尽早完成你所订的货物，以便在11月你的伙伴安内吉利先生来到时，可以进行工作。

1719年11月史氏从广州写给德·玛托斯，希望曾应葵能到南加里曼丹及吕宋代为收购海参。信是这么说：

祈望那位华人甲必丹派遣一艘大船到马辰（Bangermassin）及苏比克岛（Island Subic）大量采购买海参（hysam）或叫做 Beche de Mer。我将付任何款项，因为明年在中国这里这类商品将卖的好价钱。因此，在他遣出船只之前，祈望现在一定尽早要派遣一艘谷丁船（guntin）停泊等候，直到我抵达马六甲，因为它（指曾应葵的商船）或许在我从马德拉斯回来之前无法及时回棹，因为来回马辰行程将须要5或6个月。⁶²

Bangermassin（马辰），今拼音作Banjarmasin，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南加里曼丹的首府，位于巴里托河（Barito River）及马塔普拉河（Martapura River）交汇的三角洲之上。苏比克岛位于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苏比克湾（Subic Bay）。这段文字显示曾应葵在东南亚贸易网络是相当广阔，除了南下巴达维亚、亚齐、廖内，他向东横渡南中国海，远至加里曼丹、印尼的望加锡⁶³、吕宋等地贸易。

（二）曾应葵与史氏的贸易关系

次说曾应葵与史氏的贸易关系。

从上引曾应葵1719年8月7日书写的信函看，他是史氏的贸易伙伴。自1711年5月至1722年12月长达11年半的时间，史氏前往广州进行贸易凡8次。第一次航程自1711年5月至1712年初。⁶⁴ 第二次介于1713

年5月20日至1714年初。第三次1714年6月与1715年6月，为期整整一年。⁶⁵ 这三次航程，史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受僱为“布塞拉商人”号（*Bussorah Merchant*）⁶⁶、“亚米地”号（*Amity*）⁶⁷上的大班（*supercargo*）。⁶⁸ 身为大班，史氏是商船上的营运主管，也是投资者的随船代表。他负责监督将投资人所要售卖的货物，以及一箱箱的铸币装载在船上。在抵达交易地点后，售出货物，并将现金兑换该国通货，购回投资人所投资的货物运回。一般上，他须懂得一些外语如葡萄牙语；具备外交能力，从而能与各地贸易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⁶⁹

1717年6月，史氏向东印度公司申请成为自由商人获得批准后，他与多位投资人合资购买“博尼塔”号（*Bonita*），计划川行于印度与中国贸易航线。就此，自第三次至第八次，史氏即以船主之一的身份亲自出洋，兼任大班要职。这几次的往返航程时间分别是：自1718年7月14日至1719年春（第三次）、1719年春至1720年3月底（第四次）⁷⁰、1720年6月至1721年2月（第五次）、⁷¹ 1721年至1722年3月（第六次）⁷²、自1722年6月至12月（第七次）及1722年6月至11月离开广州（第八次）。史氏成为船主之一后，经营方式和东印度公司不同，并非自船自营，除了投资者出钱买货，⁷³ 也招揽其他客商附搭商品，运送至不同的目的地销售。

史氏在第二至第六次往广州、回印度的途中都有停留马六甲，进行交易。第一次到马六甲是在1713年，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曾应葵，⁷⁴ 最后一次是在1720年年底。⁷⁵ 在这7年10多次见面交往中，他们俩建立起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曾应葵充当史氏在马六甲进出口贸易的中介人。史氏从印度或中国运载货物，停留马六甲，卸下部分货品交由曾应葵销售；然后曾应葵利用销售所得款项代购黄金、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⁷⁶ 的商品，缴交给史氏在马六甲的代理人德·玛托斯，或待下回史氏途经马六甲时亲自缴交。

到底曾、史俩是如何进行交易？贸易商品有哪些？

史氏从印度运入马六甲的商品有印度棉织品、鸦片等，从中国运入的则有茶、瓷器等。他从马六甲运出的有：燕窝⁷⁷、海参、锡、黄金、糖、

藤等。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商品中，有些是可以自由买卖交易，但有几种则为马六甲荷兰政府当局所禁止的。

先说一般自由买卖商品。

(1) 藤：藤是仅次于木材和竹材的重要林产品。它是史氏多次请求曾应葵收购的主要商品之一。⁷⁸ 藤有两类。第一类种间直径较大的，英语叫做rottinger、rattan、cane，中文叫做“沙藤”或“藤子”。⁷⁹ 马六甲这种粗藤在欧洲非常盛行，因为它比木轻便，但却是硬，且具弹性，是做装饰用的拐杖的材料。17和18世纪，因法国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喜欢手持拐杖，影响所至，公共场合大家仿效，不论是男女甚至小孩，都放弃配剑，改持拐杖，就此形成时尚潮流，成为上层社会贵族身份的象征。⁸⁰ 另一类是种间直径较小的，叫做snor rottinger、binding rattan，中文叫做“藤片”、“藤条”，这种产品是用来捆绑船上货物的极佳条索。⁸¹

史氏书信中“canes”和“rattans”并举，但较多使用的是“canes”这个字眼，可见两者是有不同的，前者即是“沙藤”，后者为“藤条”。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曾应葵提供给史氏的藤应该有上述两种。1714年6月底，在往广州途中，史氏停留马六甲，那时曾应葵出海贸易，于是史氏写了一纸字条给代理人德·玛托斯，请他在曾应葵返棹时，代为接受、检查曾氏缴交的商品，特别是藤的长度是否符合所订尺寸（长32或29英寸），并租用货仓存放它们。⁸² 1720年8月，史氏又和曾应葵签下合约，付给他1,875帕塔卡（patacas，西班牙银元）作为购买100,000条32英寸长的藤。⁸³ 购买到藤后，史氏将它们运返印度售卖，赚取可观的利润。⁸⁴

(2) 海参。中国市场对这种海产品需求相当高，也因此其商业价值颇高。单在1711年（康熙五十年）就有34艘唐船从日本载回海参146,386斤。⁸⁵ 同样的，海参在马六甲也可卖到好价。1714年史氏就告诉威廉·赫尔斯特船长（Captian William Hurst），在马六甲海参（黑色的那种）每担市价高达5至6塔。⁸⁶ 1719年11月史氏从广州写信与其马六甲代理人，希望曾应葵能“派遣一艘大船到马辰及苏必岛大量采购买海参。我将付任何款项，因为明年在中国这类商品将卖得好价钱。”⁸⁷

次说违禁商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宣称，他们与占领地的统治者已签订条约，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大部分的锡和胡椒归他们所有，而且他们对马六甲海峡的鸦片贸易拥有垄断专利权，他们从印度输入鸦片，满足马来半岛一些港口的需求。但是，在印度势力强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港脚商人并不接受这样的声明，他们认为，其实荷兰人是没有实力来施行这个政策。英国港脚船长相信，只要小心谨慎，贿赂当地官员，还是可以经营这类商品的。⁸⁸ 详细爬梳《史氏档案》，得知史氏和马六甲荷兰总督荷马纽斯·万·苏志里（Hermanus van Suchelen, 1717-27年在任）的关系友好，总督及总督夫人多次请他到中国时，代购一些中商品，他都认真办理；⁸⁹ 1722年12月有意回乡归里，安享晚年时，他甚至写了一封信向总督道别。⁹⁰ 细心审查史氏所记商业来往账目，没发现有任何贿赂的迹象：史氏与总督之关系公私分明，总督付还史氏购买商品的一切费用。史氏心知肚明，对违命英国港脚商人，马六甲的荷兰政府决意追查到底，绝不宽容，因此，他唯有小心翼翼，通过曾应葵（有时包括德·玛托斯）间接地进行这类交易。

（1）鸦片。荷兰东印度公司严禁他国商船输入马六甲鸦片。条例指明，任何商船如发现载有这种商品，货和船将被充公、拍卖，所得归荷兰公司。但是，由于鸦片在苏门答腊西岸卖价一箱高达300西班牙银元，再转手售卖，可索售卖价多一倍价钱，⁹¹ 受如此高厚利润诱惑，英国东印度公司及港脚商人当然不会就此放弃。早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输送鸦片到东南亚地区。1703年“斯特雷特姆”号（*Stretham*）从马德拉斯往中国途中，运来一些鸦片到亚齐出售。⁹² 同样的，英国港脚商人在马六甲海峡也常冒险走私，谋图高利。1719年7月，史氏就在马六甲脱售23箱鸦片，售价每箱260里克斯银元（Rixdollars）。⁹³ 1720年8月，又再送来46箱鸦片（其中10箱是代里查·本杨[Richard Benyon, 1698-1774; 1735-1744年为马德拉斯总督]销售）交由曾应葵与德·玛托斯转销。⁹⁴

（2）锡：锡是利润颇高的一种金属商品，它也是史氏在马六甲所欲收购的主要货品之一。1714年，史氏就曾告诉赫尔斯特船长，当他抵达均克锡兰（*Junk Ceylon*, 今泰国南部的普吉岛Phuket Island）时，应售出船上一些货物，腾出舱位，尽量转购锡，载回印度。⁹⁵ 但是，在马六甲，这

种金属是不准运输出口的。话虽如此，英国港脚商人途经此地时，还是冒险设法采购这种金属。马六甲荷兰政府就发现，英国港脚商人理查·哇里斯船长（Captain Richard Wallis）即违此禁令，有意严加追查。知道这事后，1719年7月，史氏写了一封信，向尚停留在均克锡兰的“推普利坎”号（*Triplicane*）船长史地芬·巫豪斯（Captain Stephen Woodhouse）通风报信，说荷兰政府怀疑他就像哇里斯船长一样，前来收购锡矿，因此决定绝不准许其商船停留超过一个钟头。史氏祈望巫豪斯船长能为其他英国商人着想，避免再次触怒政府当局。⁹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719年8月，史氏通过曾应葵，间接向马来人甲必丹代为收购300担（*pikuls*）的锡。⁹⁷

（3）金：金的价格，中国比印度、欧洲低。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广州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至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至1：14。在1790年代，印度莫卧儿帝国的金、银比价是1：9。⁹⁸ 约在1700年时，中国的金只值欧洲铸造价格的三分之二，而且印度的需求量大。⁹⁹ “只要中国的黄金价格比较低，而白银价格又出乎高出一倍，白银就会被吸引到中国去换黄金，中国就会出口黄金。”¹⁰⁰ 除了在中国购买黄金，英国港脚商人也在马六甲购买东南亚各地生产和出口黄金输运到印度去。曾应葵就多次代史氏收购黄金。¹⁰¹ 1720年8月，史氏提供曾应葵20包总值1305塔（*pagodas*）的商品（那是史氏代圣乔治堡首席法官[Chief Judge]理查·赫尔登斯[Richard Herdens]经营），并嘱咐他将售货所得款项，代他转购黄金。¹⁰²

（4）蔗糖：在印度，蔗糖是高利润商品之一，它和铜、中国白铜（*tutenag*，印度造船用的一种铜、锌和镍合金）成为压舱物，被带回印度。¹⁰³ 17世纪上半叶，糖是荷兰人在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中居主要地位。当时孟加拉国蔗糖比爪哇蔗糖便宜。但是，在17世纪最后10年，由于印度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再加上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巴达维亚政府控制糖的生产量和强迫降价，¹⁰⁴ 于是，英国人就大量到中国¹⁰⁵、爪哇等地运输蔗糖到印度售卖。1719年，史氏就请曾应葵到爪哇收购糖。¹⁰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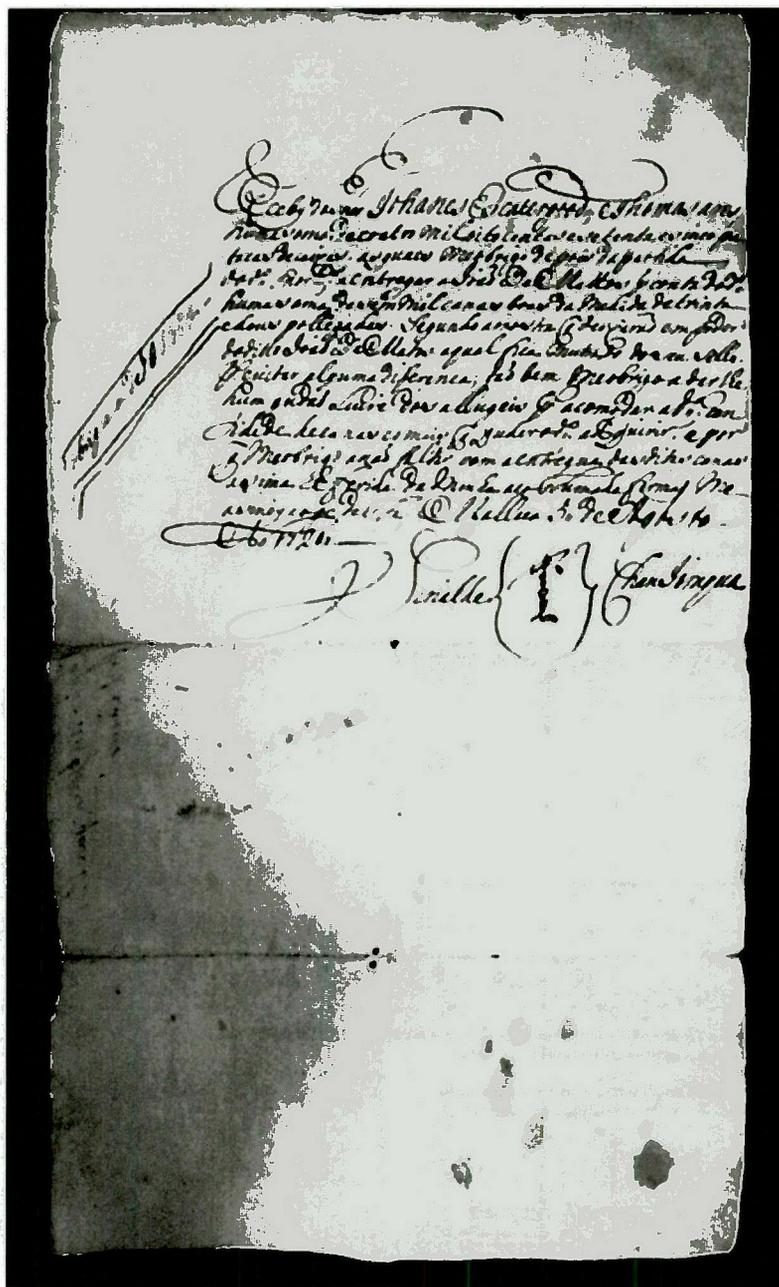
当然，当我们细心阅读《史氏档案》后，发现曾应葵不仅是史氏的贸易搭档。在生意来往一事上，他们俩是互相信任的；在个人私交方面，

曾应葵是史氏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认识曾应葵一年后，1714年，史氏就曾写信给赫尔斯特船长，告诉他一旦抵达“马六甲，您要设法拜见我向您推荐的华人甲必丹。您把全部的海参卖给他，而他将给您一车的蔗糖、沙藤（canes）和藤条（rattans）。”¹⁰⁷ 后来，史氏也介绍另一英国港脚商人约翰·包尼（J. Powney）给曾应葵认识，并进行交易。¹⁰⁸ 1719年，史氏又向巫豪斯船长说，万一因马六甲政府追究查哇里斯船长偷运锡出境一事，遇上麻烦，他应向曾应葵及德·玛托斯寻求协助。¹⁰⁹ 可见在史氏眼中，曾应葵是个可靠的朋友。1720年3月，史氏就贷款3,351帕塔卡（patacas，西班牙银元）给曾应葵。¹¹⁰

正是这样密切的关系，史氏为曾应葵提供一些商机。1719年7月25日，通过他的介绍，曾应葵借给亚美利亚洲人阿拉顿·拉札罗（Aratum Lazaro）3,005西班牙银元（patacas of caixas）购货输往外地售卖，利息25%，条件是一旦商船“麦多那敬礼号”（*Madona Salute*）从暹罗抵达马六甲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¹¹¹ 该年11月，曾应葵在短短几个月，就赚了一大笔利息。¹¹² 1721年2月，在史氏的推荐下，曾应葵投资“耶路撒冷”号（*Jerusalem*）¹¹³ 所运载的货物，投资额高达4,000比塞塔（piastres，西班牙货币，马六甲、葡萄牙使用）。¹¹⁴

1722年6月30日，史氏从马德拉斯启航，这是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广州贸易。这时，史氏已经累积了高达4万英镑的财富，想想身体健康不是太好，有意返回祖国安享晚年。该年12月18日，他改乘“莱尔号”（*Lyell*）准备从广州回英国，经过半年的航程，1723年春抵达朴茨茅斯（*Portsmouth*）。几天后，1723年6月12日，史氏就病逝。¹¹⁵ 曾应葵就此失去一个友好英国人的贸易伙伴。

图片6：曾应葵与史卡特尔古德签署的合约（志日1720年8月5日）



五、余论

叶华芬在〈马六甲之华人〉一文中说，当甲必丹曾六官（其禄）离世后，“曾其禄的一个儿子被委甲必丹。后来可能有另一位姓曾对接续他。之后一个姓陈的被委任做甲必丹。”（One of Chan Lak koa's son was appointed as Kapitan. Then another Chan probably succeeded him. After that a Tan was made Kapitan.....）¹¹⁶ 今天，我们发现在曾其禄之后，其子应葵接续其职，之后是曾宪魁（1725-1765），然后是陈承阳（1703-1784，即叶氏所说的陈氏甲必丹）。叶氏之说完全得到证实。不过，日比野丈夫持不同的看法。他说：

曾其禄去世是1718年，所以此曾宪魁当然不是叶师所说的曾其禄的儿子。那么，继其之后者，大概还有另一位姓曾对人。叶师的意见，认为曾其禄之后，尚有两位甲必丹，但不知其以何为根据。今假定曾宪魁以1754年三十岁任甲必丹，距离曾其禄身后亦有36年。在此期间，至少应该还有两位甲必丹。总之在此40年前后已成为空白了，以后才有曾宪魁的人。这一点是从来都没有人注意到。¹¹⁷

日比野的意思是说，如果曾宪魁是在1754年30岁那年任甲必丹，因此曾其禄去世那年至曾宪魁担任甲必丹那年，中间相隔长达40年，应有两位甲必丹。前些时候，笔者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不过，近日，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Tsan Hiongqua（曾宪魁）出任甲必丹其实是在1744年，时年仅20岁。¹¹⁸ 从1714年至1744年，间隔时间仅是30年（不是如日比野所推算的40年），这是曾应葵担任甲必丹的年数。上面我们说过，假如1714年曾应葵担任甲必丹是25岁，做了30年代甲必丹，也是55岁，不算太老，这应该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日比野的推算似有商榷的余地。

表1：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一览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备注
第一任	郑启基	1572-1617	福建漳州	叶华芬〈华人〉。
第二任	Notchin	未详		日比野〈系谱〉。荷兰文档案作Nootsian。墓至今未被发现。
第三任	李为经	1612-1688	福建同安	庄钦永〈新探〉：Balthasar Bort, 'Report of Governor Balthasar Bort on Malacca, 1678', <i>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 , vol. 5 Part 1 (August 1927), pp.50, 89, 125 & 131, Si Sia为一名海商，1677年，他从马六甲运载胡椒往福建漳州贸易，因售价过低，大为亏本。他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创设的孤儿院理事之一。苏尔梦〈李为经〉认为Si Sia就是李为经。笔者同意苏尔梦之说。傅、陈〈萃编〉；阮湧伽〈补遗〉1644年抵达马六甲。1685年出资购买三宝山为华人坟山。墓在今三宝山隔一道路的Bukit Tempurong东面。
第四任	李正壕	1662-1708	福建同安	傅、陈〈萃编〉。又名芳，字肇成，号仲坚，李为经之次子，娶马六甲人为妻。墓至今未被发现。
第五任	曾其祿	1643-1718	福建厦门	傅、陈〈萃编〉。字伯中，娶李为经次女成金为妻，是为李正壕之妹夫。
第六任	曾应葵	未详	福建厦门	庄钦永〈新探〉：曾其祿之子。《史氏档案》姓名英语拼音作Chan Jamqua或Chan Youngqua。墓至今未被发现。

第七任	曾宪魁	1725-1765		傅、陈〈萃编〉。乳名照官。永按：荷兰档案Tsan Hiongqua。据Nordin Hussin, <i>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i> (第202页), 1744年受委为甲必丹。
第八任	陈承阳	1703-1784	福建厦门	永按：荷兰档案中作Tan Tinko。据Nordin Hussin, <i>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i> (第204、205页), 他是在1775年受委管理Herenstraat (Heeren Street 荷兰街, 今易名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敦陈祯禄街) 区华人事务; 1782年受委管理Jonkerstraat (Jonker Street, 鸡场街) 区事务。墓在三宝山。
第九任	陈起厚	1748-1794		傅、陈〈萃编〉; 庄钦永〈碑文〉。永按：陈起厚, 讳淳廉, 又名叠, 字德馨, 谥英毅其女珠娘嫁给第十一人甲必丹蔡士章之三男滄杰为妻。荷兰档案Tan Tiapko。Nordin Hussin, <i>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i> (第204、205页), 他是在1782、1793年分别受委管理荷兰区华人事务。墓原在阿逸黎黎 (Ayer Leleh), 今已不复存在。
第十任	蔡士章	1750-1802	福建海澄	傅、陈〈萃编〉; 庄钦永〈碑文〉。又名乔, 字端甫, 谥号篤平。墓原在阿逸黎黎, 今已不复存在。
第十一任	曾有亮	1771-1822		傅、陈〈萃编〉; 郑良树〈补义〉。讳名专一, 有亮大概是其字号, 谥号敬信。墓在三宝山。

第十二任	曾佛霖	约1793-1874	傅、陈〈萃编〉；庄钦永〈新探〉。英文姓名英语拼音作Chan Olim、Chan Hoot Lim、Chan Hood Lim，又有简称作Hoolim。佛霖其名，世芳大概是他的字或号，谥号振耀、达尊。墓在马六甲中央医院后面。
------	-----	------------	---

资料来源：

- (1) 叶华芬〈华人〉：Yeh Hua Fen. "The Chinese of Malacca", in *Historical Guide of Malacca* (Malacca: Malacca Historical Society, 1936)
- (2) 日比野〈系谱〉：〔日〕日比野丈夫著，刘果因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载黄存燊等著，张清江编译（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第175-205页（原文〈マラツカのチャイニーズカゼクソの系谱〉，载《东南アジア研究》6（4）（1969））；
- (3) 〔日〕日比野丈夫著，潘明智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关于近年新发现的资料〉，《亚洲文化》第15期（1991），第116-120页。
- (4) 傅、陈〈萃编〉：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
- (5) 郑良树〈补义〉：郑良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义〉，《亚洲文化》第3期（1984），第2-7页；
- (6) 庄钦永〈新探〉：庄钦永〈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新探〉，载氏著《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第7-31页；
- (7) 庄钦永〈碑文〉：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12期（1998年10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刊）；
- (8) 阮湧仰〈补遗〉：阮湧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以《厦门光裕堂李氏族谱》为依据〉，《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1期（2015年6月），第59-70页；
- (9) 苏尔梦〈李为经〉：Claudine Salmon, "Commemorating Chinese Merchant Benefactors in Malacca: The Case of Li Weijing (1618-1688)",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淡江史学) No. 27 (2015), pp. 119-133.

六、结语

自1936年叶华芬〈马六甲之华人〉刊行后，学界藉着马六甲青云亭内所供奉的众多华人甲必神主牌以及墓碑文字，拟出相当完整的甲必丹系谱。但由于受资料所限，不免有所遗漏。1980年代末，笔者据英文史料，增添了另外两位甲必丹名字，写成〈新探〉一短文。近日重新详细阅读《史氏档案》，对其中的Chan Jamqua写成将近二万多字的长文，这是我在放弃新马华人史研究将近二十年后所撰写的一篇文章。在结束时，略书几句：

一，在撰写〈新探〉时，笔者无法知道《史氏档案》中的Chan Jamqua的正确中文名字，仅从叶文晓得他是甲必丹曾其祿的儿子，并推测他可能是曾应菊。今得知其实为曾应葵。至此，我们终于确知这位被历史遗忘了整整三个世纪的甲必丹的中文姓名了。

二，最迟在1714年，即其父亲去世之前4年，曾应葵就肩负甲必丹重职。以往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错误认识，甲必丹是终身制。一位甲必丹去世后，才由另一个接任。今天我们确知事实上并非如此。在1714年或之前，可能由于健康关系，曾其祿就卸下甲必丹重任，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同意后，由其子应葵接续其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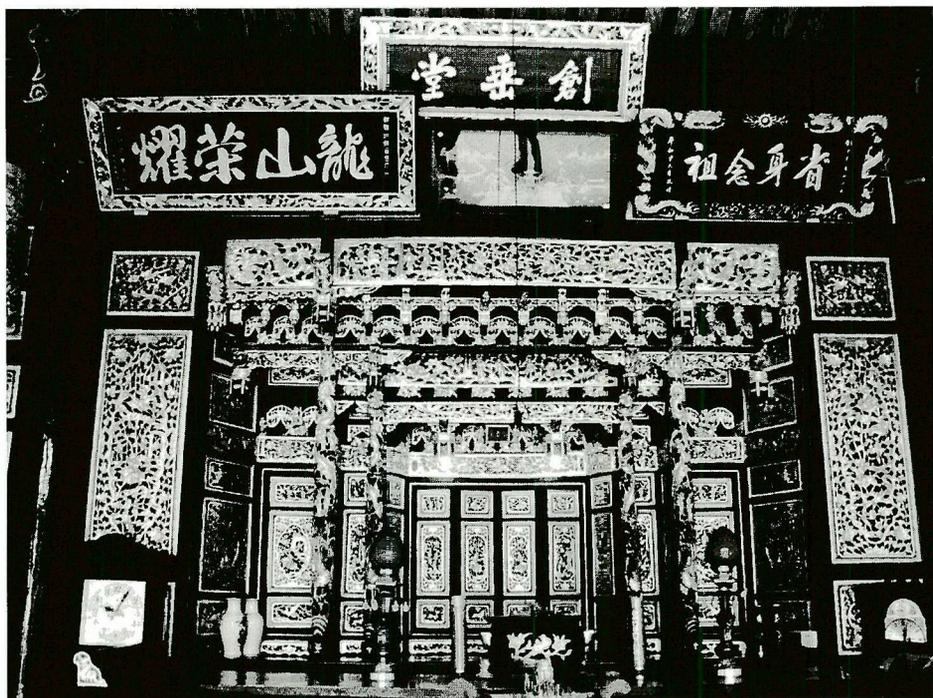
三，陈国栋指出，“在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人直接介入亚洲内部贸易的情况尚属有限。可是讲述十七八世纪亚洲海上贸易史的人都太强调欧洲人的角色了，以致我们往往有一个印象，好像说欧洲人来了以后，亚洲人自己经营的贸易就衰落了。其实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对这一部分历史研究不多、认识不多。”¹¹⁹ 这篇文章利用《史氏档案》中丰富的史料，勾勒出在1771年康熙颁布海禁令之前，曾应葵到广州贸易，与林奇逢等认识；海禁令施行后，他停止北上中国交易，就此专注在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其商船南至巴达维亚，东至南加里曼丹的马辰、菲律宾吕宋一带。文章也记述曾应葵与马德拉斯港脚商人史氏等人的贸易关系。这是以往我们所未知未闻的。

四，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认为曾其祿去世那年（1718年）至曾宪魁担

任甲必丹那年，中间相隔40年，所以这期间应有两位甲必丹。今知曾应葵在1714年或之前就已接任甲必丹，曾宪魁也在1744年就已受委为甲必丹，两人出任甲必丹年代仅间隔30年，期间当没有另外一位甲必丹。日比野之质疑，似难成立。

多年来，学界对众多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认识，除了他们的籍贯、生卒年外，有关他们的生平事迹，几乎一片空白。近日，由于《李氏族谱》的发现，经苏尔梦教授、柯兰博士及阮湧侗的撰研，我们始对李为经的生平事迹有更多的认识。续三位学者之后，笔者据《史氏档案》草成此文。除了填补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的遗漏外，它对曾应葵的海上贸易活动及他与史氏的关系有一些具体的记述，让学界对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这个课题的认识推前走了一小步。文中若有不足与错误，尚希硕学大家多所补充与匡正。

图片7：曾氏宗祠内部（苏尔梦教授摄于2014年）



注释

- 1 阮湧伽〈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以《厦门光裕堂李氏族谱》为依据〉，《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1期（2015年6月），第67、68页。
- 2 Nordin Hu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Dutch Melaka and English Penang, 1780-1830* (Copenhagen: NIAS, 2007), pp. 1-2.
- 3 Mss Eur C 387/4, "History of the Papers", p. 197; Mary Clapinson and T. D. Rogers, *Summary Catalogue of Post-Medieval Western Manuscript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Acquisitions 1916-19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 249.
- 4 "The Scattergood Papers", *History*, Vol. 19 Issue 74 (September 1934), pp. 129-130.
- 5 按，当年这个手稿是属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藏书，后归入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藏书（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该手稿目录标题作：Typed copy of correspondence, accounts, legal papers of John Scattergood (1681-1724), Madras merchant 1698-1723, chiefly concerning travels, business and family affairs.
- 6 Mss Eur C 387/2, p. 395, John Sacttergood to John De Matto, dated November 1719. 按，为方便读者了解所引每个文件的内容，笔者加上自己所拟定的标题。以下同，不再注明。
- 7 载庄钦永《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第9-16页。
- 8 例如，王付兵〈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66页；Claudine Salmon, "Commemorating Chinese Merchant Benefactors in Malacca: The Case of Li Weijing (1618-1688)",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淡江史学, No. 27 (2015), pp. 123-124. 又曾衍盛《青云亭个案研究：马来西亚最古老庙宇》（马六甲：著者，2011）第32页在引用笔者拙文时，将Cham Jamqua之名除去，似乎不接受曾其祿、曾宪魁之间有甲必丹之说。
- 9 C是全宗号，即C系列（Series C），106是目录号，170、171是案卷编号。
- 10 例如Mss Eur C 387/3, p. 8. Acknowledgment of receipt of 10 chests of opium belonging to Richard Benyon by Chan Jamqua and Joas de Matos, dated Malacca, 5 August 1720.
- 11 例如Mss Eur C 387/1, p. 36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June 1714.
- 12 例如Mss Eur C 387/3, p.12, Acknowledgment of receipt of 1775 patacas of caixas for order of canes signed by Cham Jamqua, dated 5 August 1720. "Jan" 即 "Jam" 之另一拼音，也有作 "John"，如Mss Eur C 387/ 2, pp. 318-319,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Malacca, dated 7 August 1719.
- 13 Thomas Barclay,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hanghai: Prin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9), p. 115.
- 14 （清）周凯纂《厦门志》（[厦门]：玉屏书院道光己亥年[1839]）卷十五风俗记，第10页上。

- 15 Thomas Barclay,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p. 82.
- 16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8页。
- 17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Leiden: Brill, 2007), p. 77;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0, 347 & 520.
- 18 〈曾应芸神主〉，载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第233页。
- 19 例如九世祖李达吾、文周，十世祖仁亭、夺一、砥节、泮英等均娶曾氏家族闺女为妻室。参见《李氏族谱》，第16、17、18、20、21及23页。
- 20 据意娘神主牌，她生于壬子年，即康熙十一年，西元1672年，张清江编译之译文误作1572年；而其卒年甲戌年，当是乾隆十九年，又误作“十六年”。参见（日）日比野丈夫著，刘果因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载黄存燊等著，张清江编译《新马华人甲必丹》（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第190页。
- 21 按，笔者今重视〈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新探〉中“曾其祿世系图”（第16页），发现其中有失误。据意娘神主牌，应芸名字不在孝男之中，故他当为李成金所生，特此更正。参阅日比野丈夫（日）日比野丈夫著，刘果因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第189-190页。
- 22 合理的推测是，当曾应葵去世时，在青云亭内有设置其神主牌，后因某种原因（如遭虫蛀蚀损坏），没流传下来。
- 23 本文注脚其姓氏据《史氏档案》原文，不做统一规划。
- 24 Mss Eur C 387/1, p. 36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June 1714.
- 25 据1688年人口统计，居住在马六甲市区的葡萄牙-欧亚人有1445人，占总人数之33.58%；马来人443人，占10.29%；华人292人，占6.78%，印度人135人，占3.13%，奴隶1987人，占46.18%。葡萄牙-欧亚人，指的是葡萄牙人与马六甲本地人或印度人结婚后所生下的后裔。参见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pp. xxvi, note 24 & 164.
- 26 《李氏族谱》，第33页；（日）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第189页。
- 27 《李氏族谱》，第38页。
- 28 有些文件是约翰·德·玛托斯与曾应葵联合签署，它们应该是玛托斯、曾应葵共同拟就。
- 29 Mss Eur C 387/ 2, p. 318,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dated Malacca, 7 August 1719.
- 30 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氏著《中国海洋史论集》（台北：联经，2000），第238-239页。

- 31 As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 eds.,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1800*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
- 32 〈甲必丹李公颂德碑〉置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却使用“龙飞”纪年; “避难义士”曾其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离世, 神主牌使用“故明”年号。参见〈甲必丹李公颂德碑〉、〈曾其祿神位〉,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册, 第223、231页; 阮湧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 第68页; 苏文菁《海洋英雄郑成功》(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第49-50页。
- 33 《李氏族谱》, 第33页。
- 34 《李氏族谱》, 第19页。
- 35 施琅《海疆底定疏》, 氏著《靖海纪事》(台北市: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8), 第70页。
- 36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第456页。
- 37 当时英国人在亚洲从事两类贸易, 一是航路经过好望角的欧亚之间的“欧洲”贸易, 一是航路没有经过好望角的“港脚”贸易。港脚贸易范围很广, 涉及西向、东向、印度沿岸三种, 其中西向、东向最为重要。参见池雅静《18世纪英国在亚洲港脚贸易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未刊硕士论文(2010年), 第2页。
- 38 Weng Eang Cheong, *The Hong Merc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7), p. 29.
- 39 P. J. Marshall, “Private British Trade in the India Ocean Before 1800”, in *India and Indian Ocean 1500-1800*, edited by As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2.
- 40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第163-164页。
- 41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 载氏著《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第13-14页;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 第223页;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 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第206页;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p. 57.
- 42 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由于国内经济的需要, 清廷乃从高其焯奏, 允开南洋贸易。
- 43 Mss Eur C 387/4, “History of the papers”, p. 206.
- 44 Mss Eur C 387/ 2, pp. 318-319.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Malacca, dated 7 August 1719.
- 45 *pesas de lenas*, 意思不明, 西班牙语“lena”意思是木, 故疑*pesas de lenas*为一种

木。

- 46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68-270.
- 47 Mss Eur C 387/1, p. 409, John Scattergood to Messrs John Raworth and Richard Bourouhier, dated Canton, November 1714.
- 48 Mss Eur C 387/2, p. 14, Linqua and Anqua to John Scattergood, dated Canton, 1 February 1715.
- 49 Cheong, *The Hong Mercants of Canton*, pp. 30, 32, 131 & 132;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in conjunction with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Macau, 2005), p.11.
- 50 参阅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58 & 179; Cheong, *The Hong Mercants of Canton*, pp. 31-346, 58-59, 129-133 & 300; 翁佳音〈17世纪后半叶的漳州海商与通事〉，《历史台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期（2013年11月），第21-23页。
- 51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第190-193页。
- 52 Cheong, *The Hong Mercants of Canton*, pp. 31-32.
- 53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Volume 1, pp. 102-103, 156 & 163; Cheong,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pp. 30 and 132;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p. 11.
- 54 Mss Eur C 387/2, pp. 360-361, John Scattergood to brother Fenwick, dated Canton, November 1719; Mss Eur C 387/2, pp. 362-363, John Scattergood to brother Elihu, dated Canton, November 1719.
- 55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Volume 1, pp. 102-103, 156 & 163.
- 56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p. 11.
- 57 Mss Eur C 387/2, p. 304, Account, July 1719. 按，18世纪马德拉斯通行的货币单位：80个克斯等于1个法南，42个法南等于1塔。
- 58 土茯苓，百合科多年生常绿攀缘状灌木，多生于山坡或林下，分布于中国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常于夏、秋二季采挖，入药部分只选择其干燥后的根茎。除去须根，即可入药；或趁鲜切成薄片后干燥、入药。具有除湿，解毒，通利关节的作用。
- 59 Mss Eur C 387/ 2, pp. 318-319.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dated Malacca, 7 August 1719; Mss Eur C 387/2, p. 394, John Scattergood to Cham Younqua, dated November 1719; Mss Eur C 387/2, p. 39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Canton], November 1719.
- 60 Mss Eur C 387/2, p. 394, John Scattergood to Cham Younqua, dated November 1719. 誊录本Suequa，当是Suqua之另一拼写，即陈寿官，参见Van Dyke, *The Canton*

- Trade*, p.11.
- 61 Mss Eur C 387/3, p. 192, John Scattergood's Malacca Account current &c, 8 February – 26 December 1821 (regarding Jan Younqua the China Captain), dated Malacca, Feb 8, 1720/21.
- 62 Mss Eur C 387/2, p. 39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Canton], November 1719. Beche de Mer, 海参之英文、法文译名, 马来语叫做trepang。Guntin, 誉录本误作“quntin”。据Leonor de Seabra的研究, guntin可能是源自爪哇的一种船只。参见Leonor de Seabra, translated by Custodia Cavaco Martins, Mario Pinharanda Nunes and Alan Norman Baxter. *The Embassy of Pero Vaz de Siqueira to Siam (1684-1686)*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o, 2005), p. 355.
- 63 史氏账目记录曾应葵尚欠载往望加锡货物的款项。参见Mss Eur C 387/3, p. 126, Captain Chinaman's account recorded by John Scattergood, dated [19 February 1720/1].
- 64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 261.
- 65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63-264.
- 66 “布塞拉商人”号的船主是约翰·郭克罗福 (John Cockcroft)、菲力·甘蒙 (Philip Gamon) 及詹姆斯·班宁 (James Penning) 等。参阅Mss Eur C 387/ 1, pp. 129-131, Articles of agreement for the *Bussora Merchant*, dated Fort St. Geogre, 9, 12 & 18 May 1711.
- 67 “亚米地”号的船主是马德拉斯总督爱德华·哈里森 (Edward Harrison, 1711-1717年在任) 和孟买总督威廉·埃斯拉比 (Wm Aislabie, 1708-1715年在任) 等。Mss Eur C 387/1, p. 320, Dividend for the Owners of ship *Amity*. 按, “阿米地”号投资人共有25人 (14位是来自马德拉斯, 11位来自孟买), 史氏投资14,500卢比, 占总数179,800之8%。参见Søren Mentz, *The English Gentleman Merchant at Work: Madras and the City of London 1660-1740*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05), p. 206.
- 68 第一次“布塞拉商人”号上与史氏同行的大班是爱德华·琼斯 (Edward Jones), 第二次、第三次“阿米地”号上同行大班分别是威廉·菲比斯 (William Phipps)、乔治·魏芝 (George Wyche)。
- 69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volume 1, p. 66.
- 70 Mss Eur C 387/3, p.10,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69-271.
- 71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71-272.
- 72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72-274.
- 73 例如史氏第三次往广州贸易时, “亚米地”号贸易额高达1万卢比, 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自由商人及马德拉斯商人投资。
- 74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62-263.

- 75 史氏在马六甲停留日期可考者如下：1714年6月底（往广州途中），12月8日（回印度途中），史氏又再停留马六甲；1719年7月6日-16日；1720年8月（往广州途中），回程中又再访问马六甲，这是史氏最后一次停留马六甲。参阅Mss Eur C 387/1, pp. 415-416, John Scattergood to Mrs Arabella Scattergood and Mr John Maubert, dated Malacca, 14 December 1714; Mss Eur C 387/3, p. 8, Acknowledgment of receipt of 10 chests of opium belonging to Richard Benyon. Chan Jamqua and Joas de Matos, dated Malacca, 5 August 1720; Mss Eur C 387/3, p.9,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of goods from John Scattergood by Cham Jamqua and Joao de Metos, dated Malacca, 5 August 1720; Mss Eur C 387/3, p.10,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Mss Eur C 387/4, "Life of John Scattergood of the Papers 1681-1723", pp. 271-272.
- 76 1717年至1720年，英国港脚和亚齐贸易中断，曾氏又代他到爪哇等地收购蔗糖等商品。参见D. K. Bassett, "British 'Country' Trade and Local Trade Networks in the Thai and Malay States, c. 1680-177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3 Part 4 (October 1989), p. 635, 638 & 640.
- 77 Mss Eur C 387/3, p.194, Account current general what I received and paid at Malacca of sundrys, Malacca, February 8, 1720/1; Mss Eur C 387/3, p.195, Account: John Younqua and John de Matt, Malacca, July 1721.
- 78 又，史氏也请德·玛托斯代为收购藤类商品。1714年德·玛托斯提供史氏1,000捆的藤。1719年7月6日，史氏乘“查罗迪”号（*Charlotte*），经过“沉闷乏味的旅程”（a tedious voyage）后抵达马六甲，待了9天。7月15日，他发觉马六甲所有藤被Boone收购，于是只好委托玛托斯代为收购。参见Mss Eur C 387/2, p.312,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15 July 1719; Mss Eur C 387/1, p.377, "Account – Senior John de Mattos", dated Malacca, 22 July 1714.
- 79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xxviii-xxxi, 68, 217, 285 & 287.
- 80 参阅Katherine Morris Lester and Bess Viola Oerke, *Accessories of Dress :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pp. 392-397; E. P. Richardson, 'Walking Stick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City of Detroit*, Vol. 23 No. 1 (October 1943), p. 6; Valerie Cumming, C.W. Cunnington and P.E. Cunnington, *The Dictionary of Fashion History* (Oxford: BERG, 2010), p. 38.
- 81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p. xxviii-xxxi, 68, 217, 285 & 287.
- 82 Mss Eur C 387/1, p. 36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June 1714.
- 83 Mss Eur C 387/3, p.12, Acknowledgment of receipt of 1775 patacas of caixas for order of canes signed by Cham Jamqua, dated Malacca, 5 August 1720. 帕塔卡（patacas），即

- 西班牙银元，参见Markus A. Denzel, *Handbook of World Exchange Rates, 1590-1914*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0), p. lxxi.
- 84 英国港脚商人将这些藤类商品运送至印度南部喀拉拉邦 (State of Kerala) 沿海市镇安壬各 (Anjenge, 今名 Anchuthengu), 转售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商馆主管威廉·吉福德 (William Gyfford)。参见 Mss Eur C 387/1, p. 300, John Scattergood to Captain Hurst, dated Surat, April 1714。
- 85 刘军、王询编著《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商品 (1368-1840)》(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第178页。
- 86 Mss Eur C 387/1, p. 300, John Scattergood to Captain [William] Hurst, dated Surat, April 1714.
- 87 Mss Eur C 387/2, p. 39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Canton], Novemeber 1719. 按, 海参之英文、法文译名叫做 Beche de Mer, 马来语则叫做 trepang。
- 88 池雅静《18世纪英国在亚洲港脚贸易研究》, 第34页。
- 89 Mss Eur C 387/3, pp. 52, 205, 358, 360, John Scattergood's Malacca Account current &c, 8 February – 26 December 1821.
- 90 Mss Eur C 387/3, p. 281, John Scattergood to Hermanus van Suchelen, Governor and Director of Malacca.
- 91 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p. 22.
- 92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ume 1, p. 136.
- 93 Mss Eur C 387/2, p.312.
Mss Eur C 387/3, p.10,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 94 Mss Eur C 387/3, p.9,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of goods from John Scattergood by Cham Jamqua and Joao de Matos, dated Malacca, 5 August 1720; Mss Eur C 387/3, p.8, Acknowledgment of receipt of 10 chests of opium belonging to Richard Benyon. Chan Jamqua and Joas de Matos., dated Malacca, 5 August 1720.
- 95 Mss Eur C 387/1, p. 300, John Scattergood to Captain Hurst, dated Surat, April 1714.
- 96 Mss Eur C 387/2, p.311,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dated Malacca, July 11, 1719.
Mss Eur C 387/2, p.316, John scattergood to Joseph Collet,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Mss Eur C 387/3, p.10,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 97 Mss Eur C 387/2, p.318,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dated Malacca, 7 August 1719. 一担 (pikul) 约等于133.3磅或60公斤。
- 98 [德]贡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著, 刘北成译《白银资本》(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第192页。

- 99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Volume 1, p. 69;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p.101.
- 100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92页。
- 101 Mss Eur C 387/2, p. 39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Canton], Novemeber 1719; Mss Eur C 387/3, p. 201, Account Re Captain China, dated Malacca, 26 December 1721.
- 102 Mss Eur C 387/3, p.10,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 103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p. 101.
- 104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p. 89.
- 105 1723年在广州出口糖，一担价格是3两，是基本粮食米的三倍（米一担0.90两）。英国商船运孟买棉到广州换糖。1716年英国“马博罗”号（*Marlborough*）载货清单中，糖和糖制品是主要商品。参阅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p. 55; 刘军、王询编著《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商品（1368-1840）》，第81页。
- 106 Mss Eur C 387/2, p.318.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dated Malacca, 7 August 1719; Mss Eur C 387/2, p. 395, John Scattergood to John de Matt, dated [Canton], November 1719.
- 107 Mss Eur C 387/1, p. 300, John Scattergood to Captain Hurst, dated Surat, April 1714.
- 108 Mss Eur C 387/3, pp. 84-85, J. Powney to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6 December 1720.
- 109 Mss Eur C 387/2, p.311,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dated Malacca, July 11, 1719.
Mss Eur C 387/2, p.316, John scattergood to Joseph Collet,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Mss Eur C 387/3, p.10, John Scattergood to Thomas Harris, dated Malacca, July 15, 1719.
- 110 Mss Eur C 387/3, p.135, Acknowledgement of loan from John Scattergood, signed by Chan Jamqua in Malacca, dated 15 March 1720.
- 111 Mss Eur C 387/2, p.317, Bond signed by Captain of the Chinese Chan Jamqua, dated Malacca, 25 July 1719. 按，Caixas, 马来语，称单数作Cas, 万丹、全爪哇及周围各岛所流通的钱币，爪哇称Pitis。参见曹永和《中国海洋史论集》（台北：联经，2000），第264页。

- 112 Mss Eur C 387/2, p. 399, John Scattergood to Arrotoon Lazaro, dated November 1719.
- 113 史氏是“耶路撒冷”号船主之一。参见Mss Eur C 387/2, pp. 466-467, Resolutions at a meeting of owners of ship *Jerusalem*, 5 June 1720.
- 114 Mss Eur C 387/3, p.218, Chan Jamqua to John Scattergood, Malacca, 19 February 1721 [1722]. 按, Piastres, 也叫做里克斯银 (Rixdollar)。一个Piastres等于60 light Stivers或48 real Dutch Stivers. 参阅*The Edinburgh Encyclopedia*, conducted by David Brewster (Philadelphia: Joseph & Edward Parker, 1832), vol. 13, p. 703.
- 115 Mss Eur 378/4, “Early Scattergoods: collaterals and direct line”, p. 279; “The Scattergood Papers”, *History* Vol. 19 Issue 74 (September 1934), p. 129.
- 116 Yeh Hua Fen. “The Chinese of Malacca”, in *Historical Guide of Malacca* (Malacca: Malacca Historical Society, 1936), p. 82.
- 117 (日) 日比野丈夫著, 刘果因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 第191页。
- 118 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p. 202.
- 119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 第19页。

参考文献

甲、档案: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C 106/170 & C 106/171 Scattergood v Raworth: Correspondence and accounts of John Scattergood relating to trade with India and China. British Library.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 Typed copy of correspondence, accounts, legal papers of John Scattergood (1681-1724), Madras merchant 1698-1723, chiefly concerning travels, business and family affairs. Mss Eur C 387/1-4. 此乃C 106/170 & C 106/171之打字誊录与翻译本。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省嘉禾里廿二都曾溪保绥德乡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未刊手稿本, 苏尔梦教授提供)

乙、图书:

Barbara Watson Andaya. “Melaka under the Dutch, 1641-1795”, in *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1400-1980*, edited by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95-241. Vol. 23 Part 4 (October 1989): 625-643.

D. K. Bassett. “British ‘Country’ Trade and Local Trade Networks in the Thai and Malay States, c. 1680-1770”,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3 Part 4 (October 1989): 625-643.

K. 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Weng Eang Cheong. *The Hong Merc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Richmond, Surrey : Curzon, 1997.
- James K. Chin. "Trade, Migration and Sojourning Community: Chinese Mercantiles in Melaka", in *Port Cities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5th-18th Centuries*, edited by Luís Filipe Barreto and Wu Zhiliang (Lisbon :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12), pp. 53-70.
- W. H. Coates. *The Old "Country Trade" of the East Indies*. London: Imray Laurie, Norie & Wilson, 1911.
-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C. A. Gibson-Hill. "The Fortification of Bukit China, Malacc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9 Part 3 (1956), 151-181.
- 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Dutch Melaka and English Penang, 1780-1830*. Copenhagen: NIAS, 2007.
- Dianne Lewis. *Jan Compagnie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641-1795*.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 Søren Mentz. *The English Gentleman Mercant at Work: Madras and the City of London 1660-1740*. Copenhagen: Museum Tusulanum Pres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05.
- Ng Chin 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Volume 1.
- Katherine Morris Lester and Bess Viola Oerke. *Accessories of Dress :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原书题名: *Accessories of Dress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rills and Furbelows of Fashion* (Peoria, Illinois: The Manual Arts Press, 1940.
- Om Prakash.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ume II.5: European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Pre-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E. P. Richardson. 'Walking Stick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City of Detroit*, Vol. 23 No. 1 (October 1943), pp. 6-8.
- Claudine Salmon. "Commemorating Chinese Merchant Benefactors in Malacca: The Case of Li Weijing (1618-1688)",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淡江史学 No. 27 (2015), pp. 119-133.
- Seabra, Leonoe de, translated by Custodia Cavaco Martins, Mario Pinharanda Nunes and Alan Norman Baxter. *The Embassy of Pero Vaz de Siqueira to Siam (1684-1686)*.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o, 2005.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in conjunction with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Macau, 2005.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Yeh Hua Fen. "The Chinese of Malacca", in *Historical Guide of Malacca* (Malacca: Malacca Historical Society, 1936), pp. 71-83.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池雅静。《18世纪英国在亚洲港脚贸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10。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

（荷）伽士特拉（Femme S. Gaastra）著，倪文君译。《荷兰东印度公司》。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刘军、王询编著。《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商品（1368-1840）》。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日）日比野丈夫著，潘明智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关于近年新发现的资料〉，《亚洲文化》第15期（1991），第116-120页。

（日）日比野丈夫著，刘果因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载黄存桑等著，张清江编译《新马华人甲必丹》（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第175-205页。

阮湧御。〈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以《厦门光裕堂李氏族谱》为依据〉，《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1期（2015年6月），第59-70页。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载氏著《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1-34页。

王付兵。〈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65-74页。

翁佳音。〈17世纪后半叶的漳州海商与通事〉，《历史台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期（2013年11月），第7-24页。

郑良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义〉，《亚洲文化》第3期（1984），第2-7页。

庄钦永。〈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新探〉，载氏著《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第7-31页。